

西方经济学

何 征 编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西方经济学

何 征 编著

责任编辑 刘 箫 周 晓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241 千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624-1469-6/F·142 定价:13.00 元

(川)新登字 020 号

前 言

重庆建筑大学(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于1981年设置了一个新系——管理工程系(现管理工程学院),并于1982年招收了几名硕士研究生。作者曾以专题形式于1983年为该班教授了《西方经济学》课程。当时在全国理工科高校管理专业中开设这门课程的,尚不多见。后经整理,于1984年写成讲义,由本院打印作为试用教材,同时在本科开设此课。经几年使用后,于1986年在自编讲义基础上加以增删、修订,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我院的正式教材;同时不少兄弟院校如重庆大学、南京建工学院、渝州大学等也先后采用此书作为教材。该书得到同行们的好评,并于1988年在四川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上获得优秀教材奖。

十余年来,我国经济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改革开放更是突飞猛进;特别是党在十四大已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我国在许多经济活动领域要与国际接轨。因此,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让学生掌握一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了解西方国家的经济语言、经济思想、经济概念、经济方法等,是很有必要、很有用处的。

但该书早已脱销,且在内容上为了适应发展的要求,也须加以补充、修订,故作者决定对原书作修订再版。

此次修订,原体系仍基本保持不变。在内容上增加了《资源配置优化:交换与生产最优条件结合》一章。这是因为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并明确指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增设这一章,介绍一点西方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以期读者在

结合我国国情对此作研究时,能有所借鉴和启迪。

在文字上,这次修订对一些行文不当或文字脱漏、印刷错误等,也作了校订。

原书中对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概念所作的评述,今天看来,有些评论仍是必要的,也较适当。如对效用理论、序数理论、基数理论、无差异分析法等,既指出其主观唯心的一面,同时也认为有其可供参考借鉴之处。当然,其中也有些似乎显得过时的,例如对“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概念,作者曾在加以评论之后,提出我国也应使用这一指标;虽然后来我国也采用了,但这次修订,仍保留作者当时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又如《供给经济学——里根经济学》一章,当时出版此书,正适逢其时,作者从当时报刊文献中收集了许多现实资料而写成,有述有评。虽然里根早已不在其位,但读者在了解当今美国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嬗变时,仍可从中获得一些线索,找到相承的脉络,故未予删除。至于《西方经济学源流梗概——代序》,是由于管理专业没有专门开设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流派这两种课程,“梗概”为他们提供一点背景知识,对他们学习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会有帮助。故仍予保留。

本书编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比较适应管理专业、特别是理工科高校管理专业教学的需要。全书在谋篇、章节设置上比较注意前后衔接,条理分明;在论述上,尽量注意对概念的把握,并尽可能辅以图表、数量方法加以阐释;内容上力图做到由浅入深,深入浅出,文字上力求简明扼要。同时,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注意使用了当时报刊上见到的有关新鲜材料,用以说明相关的问题。在教学上,本书还注意对管理专业后续课程的先行作用,如技术经济学(或工程经济)、企业管理学、管理会计、西方财务管理、西方财政金融等。

由于以上特点,学生普遍反映此书易学易懂,特别是对理工科高校管理专业学生,他们不同于财经院校学生在经济学方面所学的课程那样多。因此,他们在学了这门先行课程以后,对后续的一

系列有关专业课程所涉及的一些内容,如工程经济中的一些边际分析方法,企业管理中的成本分析、盈亏平衡……感到比较容易接受,理解上也能知源而加深理解。特别是不少学生(包括研究生)作论文时,还采用了西方经济学中所学过的原理和方法,对其研究的现实问题加以运用,结合我国特点得出具有创意的成果。

当然,毕竟作者水平有限,这次修订虽已尽力,但错误之处仍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著 者

1996年6月15日

于重庆建筑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西方经济学源流梗概

——代 序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发生,相并发展起来的。

一、政治经济学的前史——重商主义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最早理论考察的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代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西欧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全盛于16至17世纪中叶,衰落于17世纪下半叶。

早期重商主义认为货币是社会财富的唯一形态,在政策上表现为禁止金银出口,鼓励吸收外币。他们“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596页)

晚期重商主义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利润是流通中贱买贵卖产生的。他们已从“守财奴”(贮藏货币)变成资本家眼光来看待货币(加速货币周转,使 $G-G'$)。政策上取消禁止金银出口,提倡对外国商品的购买,但必须保持贸易顺差的原则。为使外贸保持有利平衡,主张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如对进口商品课以高税率,鼓励商品出口,禁止原料输出,鼓励输入,以加速本国工业的发展等等。马克思称这晚期的重商主义,才是真正的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产成了中心问题,以流通为研究对象的重商主义,必然衰落。因为它“只从商业资本运动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76 页)

所以,重商主义体系只能算作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前史。尽管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是由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莱田(1575~1622 年)在 1615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使用的,但他并未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

二、现代经济科学的产生

现代经济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是从 17 世纪下半期英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长时期开始的,即所谓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有(英)威廉·配第(1623~1687 年),(法)布阿吉尔贝尔;中经法国的魁奈、杜尔哥,并由英国的亚当·斯密集其大成;李嘉图作了进一步发展。同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就到此结束。

马克思说:“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威廉·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关系的内部联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98 页)马克思称他为“政治经济学之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 43 页)“是现代经济学的创始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71 页)

配第在其第一部著作《赋税论》中,就开始用劳动衡量商品价值,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最初基础。提出把价格区分为“自然价格”(实为价值)和“政治价格”(市场价格),政治价格围绕自然价格波动,认为价值是由等量劳动来计算的。但他又宣称“劳动是财富之父,自然是财富之母”。认为价值是由劳动与土地共同决定的。

配第分不清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区别,错误地认为“自然”也形

成价值。并且由于分不清劳动与劳动力这两个概念,错误地把生产商品的劳动,用劳动者每天消耗掉的粮食来衡量,这就是说按照劳动(力)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照此推论,就是价值决定价值,从而势必得出劳动者生产了工资,土地提供了地租的荒谬结论。这一错误,成了以后直至今日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观点的一个依据。

三、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

配第虽被称作“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但经济学还没有建立起巩固的体系,还没有打好牢固的基础。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的是重农学派。“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5 页)

重农学派是 18 世纪下半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产生的经济学派。它的创始人和领袖是魁奈(1694~177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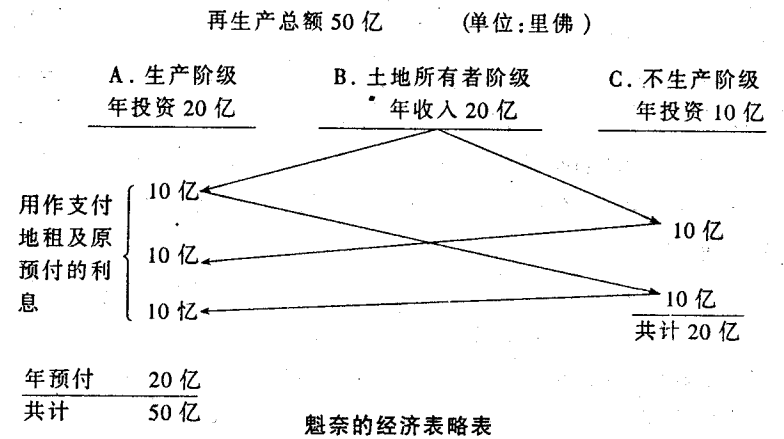
重农学派的理论中心是“纯产品”学说。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唯一的生产部门,才能使物质财富增加,生产出“纯产品”——即新创造的农产品扣除被消耗部分的余额。

魁奈在经济学研究对象上,明显地转到生产过程,探讨所谓社会的自然秩序。认为自然秩序具有客观性和永恒性。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就是“自然秩序”的表现,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于阐明自然规律,使“人的秩序”符合“自然秩序”,而实现“自然秩序”的唯一途径是实现经济自由。因此提出自由放任原则(Maxim of “Laissez - Faire, Laissez - Passer”)。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这反映了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

重农主义针对重商主义的“贱买贵卖”,提出“交换等价性”学说,这是政治经济学上的一大进步。但他们又把进行交换的商品的“生产费用相同”,作为能进行等价交换的基础,认为决定价值的不是劳动,“而是土地即自然所提供的物质以及这个物质的各种变

态构成的。”(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第一册,第 19 页)这是“生产费用论”的最早庸俗观点之一。

魁奈把资本分为“原预付”和“年预付”,这在事实上区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并将其运用在他的《经济表》中,通过图表的形式,分析社会产品及其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以及如何进行再生产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问题的考察。



产理论,实现了深刻的革命变革。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魁奈也受到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重视,把他的《经济表》称为是“现代各种方法(如局部均衡、投入产出表以及目前用以显示货币在经济过程中流通的流转图)的先驱”。(埃·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1960年英文版,第85页)

四、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古典 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古典政治经济学虽产生于17世纪的英国,并经法国重农学派的发展,但经济学的体系,却是在18世纪中叶,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来完成的。

18世纪中叶,英国工场手工业已有广泛发展,为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创造了条件,整个英国处于工业革命的前夕。英国产业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迫切要求有一种经济学体系来为其鸣锣开道。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所以斯密被称为“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经济学家”。(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86页注(44))

斯密把经济学发展成为一个庞大体系,是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完成的。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04页)

《国富论》的研究对象是财富的性质及其产生和发展。所谓国民财富,即一国所生产的产品总量。财富的本源是人的生产劳动。要增加国民财富,必须通过两个途径:一是提高在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一是增加在业工人人数。斯密认为,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坚持和加强劳动分工;要增加工人,就必须增加资本积累以购买劳动(力)。所以,他着力于研究分工、交换和货币、交换价值、工资、利润和地租,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等问题。

斯密在经济理论上的成就和错误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斯密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正确指出劳动是价值的真实源泉,最先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考察了自然价格(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关系,分析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斯密的价值论是二重性的,他的价值论由劳动决定价值(一重)转到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又一重)。

首先,由于斯密不理解劳动二重性,因而分不清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因此,他对决定价值的劳动的解释也是多种的,认为“耗费的劳动”;“购买的劳动”;“安乐、自由与幸福的牺牲”的劳动;三种都决定价值。他一边正确指出商品价值量与生产它所耗的劳动成正比,但又错误地说“商品价值量等于它能买到或支配的劳动量”,这样就陷入了价值决定价值的循环论。更为错误的是他认为“劳动时,必须牺牲等量的安乐、自由与幸福”。这成了后来“节欲”说之类的庸俗观点的先导。

其次,由于斯密混淆了劳动与劳动力这两个概念,于是在他面前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根据价值规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交换应是等量的劳动,那么,资本家利润从何而来?对这个问题他放弃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断言价值规律只适用于“初期蒙昧社会”,对“进步社会(资本主义)不适用”。于是放弃劳动价值学说,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上来。他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全部劳动产品并不总是属于劳动者。在大多数场合,他必须同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一起分享劳动产品,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为获得或生产某一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不再是决定用这个商品通常可以买到支配或换得的那个劳动量的唯一条件。显然,这里还应当有一个劳动追加量,作为预付工资和给工人提供材料的资本的利润。”(《国富论》,见《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319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根据同样理由,他认为商品的价值中还应包括地租。由此,斯

密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价值不再由消耗的劳动量决定，而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决定（构成）。他写道：“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以交换的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同上书，321页）这就是后来庸俗的生产费用论的根源。

五、李嘉图的经济学说——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继承了斯密的学说，并把古典政治经济学推向了它的最高发展阶段。

李嘉图与斯密相隔不到半世纪，但中间却发生了法国大革命与英国产业革命这样的重大事件。作为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李嘉图坚持了劳动价值论，批判了斯密的不彻底性；同时，还批判了斯密的价值由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构成的错误观点。他认为，价值可以分解为各种收入，但不能反过来说价值由几种收入构成。但李嘉图仍分不清劳动与劳动力，他断言劳动有价值，这个价值即由工人工资，由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这和斯密把购买到的劳动与消耗的劳动混为一谈是一样的错误。其次，李嘉图提出供求决定价值，这一点又成为后来庸俗经济学家的根据。

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对后来资产阶级经济学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主要点如下：

1. 把价格看成是商品与货币的数量比例关系的货币数量论。
2. 否认经济危机可能的销售论——同意萨伊“生产自行创造需要”说。
3. 强调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资本积累论。
4. 主张根据生产成本相对优势自由发展的比较成本说。这是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推崇为古典学派成熟的国际贸易理论。

六、19世纪70年代前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庸俗经济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有一个过程。马克思说：“只有在政治经济学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即在亚当·斯密以后）和形成稳固的形式时，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因素，即作为现象观念的单纯现象复写，即它的庸俗因素，才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特殊表现形式从中分离出来。”（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6~557页）

庸俗经济学处的时代，已由古典经济学所处的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斗争的时代，转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时代。他们对古典经济学，以“注释”、“补充”和“通俗化”的形式，把古典经济学中的庸俗部分（因素）分离出来，加以编纂，冒充科学，以达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目的。他们的代表人物有萨伊、马尔萨斯、穆勒、西尼尔等。

萨伊（1767~1832年）的经济理论对后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影响很大。

1. 生产三要素论。萨伊把资本主义生产归为生产一般，把资本等同于生产工具，以一般劳动偷换雇佣劳动，以土地来偷换土地所有权，并且宣称，任何生产都要具备三个要素，即劳动、资本和土地；认为三要素共同创造效用（使用价值），效用又是商品价值的基础，所以三要素共同创造价值。他反怪亚当·斯密忽视资本、土地的作用。

2. 三种收入论。萨伊认为三个要素在创造效用的过程中，各自提供了“生产服务”，分别创造并获得了相应的收入，作为自身耗费的补偿，工资、利息（润）、地租就是分别为取得劳动、资本、土地的生产性服务所付的代价。这三种收入便构成创造效用的生产费用，确定商品的价值。这样，萨伊就从生产三要素创造效用（价值）

的“效用论”，转到了工资、利息、地租三种收入（也即三种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生产费用论”。这就是萨伊以三要素论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

“生产费用论”渊源于斯密，经萨伊、马尔萨斯等人利用而提出三要素分别创造三种收入。顺便值得一提的是西尼尔（1790~1864年）所倡导的节欲论。他进一步把生产费用分为劳动与节欲。劳动是工人放弃安逸和休息所作的牺牲（斯密早已有过类似的言论），工资是这种牺牲的报酬。资本是资本家对个人消费的牺牲，是资本家节欲的结果，利息（润）就是对资本家节欲的报酬。这就是西尼尔的所谓“节欲”说，后来马歇尔用对未来享受的“等待”，凯恩斯用“流动偏好”来代替“节欲”，在实质上都是一回事。

七、19世纪70年代（向帝国主义过渡阶段）的庸俗经济学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本身固有的一切矛盾也日益尖锐和激化。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和187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就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各国工人运动有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进一步得到广泛传播，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便迫切需要一种更新的辩护理论来掩盖资本主义剥削，麻痹工人阶级斗志，并同马克思主义斗争。在这一时期中，为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有庞巴维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和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等等。

（一）奥地利学派

是近代庸俗经济学“边际效用价值论”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庞巴维克（1851~1914年）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说，特别是“边际效

用价值论”的全面发展者。

1. 边际效用价值论。19世纪中期的德国庸俗经济学家戈森(1810~1858年)可以说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先驱。他认为,“一切人类活动的目的就是要享受”。并自称发现两个“定律”:一是“欲望强度或享受递减定律”或“效用递减律”。这一“定律”是说增加的享受次数必然使每一次的享乐数量递减,直至最后享受的那个单位所增加的享乐数量(效用)为零为止。如再继续下去,甚至为负,享乐变为痛苦。这就是所谓的“戈森第一定律”。二是“享乐均等定律”,是说人在几种享乐之间有选择自由但无充分时间来享受,那么,不管这几种享受起初的绝对量如何不同,为了取得享受总量为最大,就必须在它们之间依次享受(消费)其享乐量(个量)之最大者,直至各种欲望满足之数量彼此均等为止。这又被称为“戈森第二定律”。后来发展成为“边际效用均等定律”。

由于当时在德国历史学派占统治地位,“戈森定律”并没有受到重视。到19世纪70年代,英、法、奥三国几乎同时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而以奥国学派阐述得最完整,其中,又以庞巴维克为最。

边际效用价值论者认为物品有无价值取决于物品的有用性和稀缺性,而物品的价值量则是由该物品合理使用时产生的最小效用所决定。这个最小效用叫做“边际效用”。庞巴维克者把物品本身所具有的效用歪曲为人的主观意识,并依据“效用递减规律”提出“边际效用”决定价值。这完全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虚构。

2. 时差利息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目的是妄图对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时差利息论”,则是想否定和推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

“时差利息论”认为现在财货比未来财货有更大价值,这就出现不同时间财货价值上的差异——时差。利息就来源于时差。这和前面提到的所谓“节欲”、“等待”……是一脉相承的。

(二)洛桑学派

瑞士洛桑大学经济学家所创立的学派。主要代表有瓦尔拉、帕累托等。洛桑学派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广泛运用数学方法和函数概念,考察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同时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决定问题,提出“一般均衡理论”。洛桑学派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对现代资产阶级数理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被广泛应用的一般均衡分析、线性规划方法、投入产出分析、资源配置分析等,考其渊源,都可看到洛桑学派的重大影响。

(三)剑桥学派

阿弗里德·马歇尔(1842~1924年)是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对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影响很大。他们把他和斯密、李嘉图的著作相提并论,称它为“划时代的著作”。并因此把马歇尔称为“新古典学派”的建立者。

马歇尔的经济学说主要是按照垄断资本的需要,把过去庸俗经济学的某些方面加以补充、扩大和发展。这种新的补充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特别强调心理因素,企图用心理现象来解释经济规律。二是他特别强调生物进化的观点,认为经济同自然界一样,它的进化是渐进的,他认为用“自然不能飞跃”这句格言说明经济学的基础尤为合适。在他的著作中,常常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他甚至宣称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建立“经济生物学”。

马歇尔的研究方法特点是折衷主义。他在其经济学说中综合了庸俗的生产费用论、供求论、节欲论、边际效用论、土地报酬递减论等等庸俗经济学观点,建立起一个庞杂的折衷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特别是他还把力学中的均衡概念应用到经济学中来,用活

动的动力对活动的阻力这两种相反的力量来说明价格、工资、利息等范畴,炮制了庸俗的“均衡价格”理论。“均衡价格”是马歇尔经济学说的核心。

剑桥学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时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广泛传播,无论传统的庸俗经济学,还是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边际效用价值论”,都难以单独为资本主义辩护。剑桥学派集19世纪庸俗经济学之大成,竭力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相对抗。

八、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场 “革命”——凯恩斯经济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9~1932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剑桥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庸俗经济学彻底破产,他们原来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百般粉饰,受到无情的历史事实所嘲笑,原为剑桥成员的凯恩斯,于1936年以叛离剑桥的姿态,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该书把马歇尔、庇古的观点都称之为“古典学派”加以抨击,另行创立了所谓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来代替“新古典经济学”。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把这称为所谓“凯恩斯革命”。但实际上,“剑桥”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直至今日仍然是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只不过在本世纪30年代以后,不断作了一些修正和补充。

凯恩斯抛弃传统庸俗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自动调节实现充分就业的说教。提出“有效需求”理论和“总量分析”方法。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的大小又主要决定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币的“流动偏好”以及货币数量。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就是由于这些心理因素的作用所造成的有效需求的不足,而危机的爆发则主要是由于对投资未来收益缺乏信心而引起的“资本边际效率”(预期利润率)的“突然崩